

# Opinion

Observer

上证观察家

政策执行部门要能真正领会中央政府近阶段连续出台的一系列确保经济增长措施的精神,危机当头,不仅充满信心,更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梳理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速度和数量、转型和就业、创新和监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

## 如何从“大海啸”中寻求“大智慧”

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到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央政府近阶段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确保经济增长的措施,但是,如何让政策执行部门能够深刻领会其中的精神,真正做到危机当头,不仅要充满信心,更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点,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梳理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速度和数量、转型和就业、创新和监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跑步“钱”行争夺资源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会让我们今后的结构调整付出更多更昂贵的代价。

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都已适应了外向型的增长模式,能否坦然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该如何正确应对?

众所周知,在这场金融大海啸面前,欧美不仅虚拟经济部门受到重创,实体经济也遭遇了严寒的寒冬,它至少通过贸易的途径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机遇在于美国的大众的整体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断收缩高附加值产品的开支,进而转向价廉物美商品,而这市场恰恰是像中国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最具有竞争力的。如果因为我们出口退税过低,人民币升值过快,货币政策过紧而造成了大量从事生产性生产的小企业,负担过重而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获利的机会,那么,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严重下滑的恶劣环境中,再度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销售市场而造成就业压力不能缓解的被动格局,实在是大可为惜。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另外可能带来的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对欧美继续保持贸易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无论是奥巴马还是萨科奇,都会利用自己的执政权力,要求中国平等开放国内市场,甚至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外来品。由于贸易结构的差异,国内市场高附加值产品更多的可能被进口品牌所垄断,所以,贸易逆差将被扩大,甚至短时间低增长、高逆差的可能性都会出现。而且,如果中国的企业在欧美的产品结构中缺乏竞争力,那么,尤其在沿海城市就可能面临低增长、低就业、高逆差的不利格局。这就涉及了我们要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在国际经济格局分工中的定位问题!

第二,要用新思路和大智慧去解决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今天规模以上的海内外企业和机构都在“瘦身”,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就使得我们在结构升级和优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约束条件。

这次“金融30条”中,再次强调要“限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心。这也带来了新的一组矛盾,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调整具体就反映在要关闭这些不可持续发展的淘汰产业和相关企业的问题上,随之而来的失业压力不可能都像央企那样从行政渠道去要求管理者内部消化,因为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让很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成本控制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余力去肩负起像央企那样的社会保障责任!

所以,我认为劳动力的充分移动是保障经济活力的前提条件,政府应该在阻碍劳动力移动的障碍中寻找智慧,针对产业结构调整释放出来的就业人群,政府要为他们创造就业的条件和机会,另一方面,政府要从制度变革上,比如,信用担保,免征收,投融资渠道创新上面,多为他们生财之道打开方便之门。比如再就业培训,创业扶持,退休保障等等,让没有钱的人能找到机会充分自愿地就业,让有钱的人能有时间充分自愿的消费(欧洲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方式抑制了大众过度工作的“非理性”选择,美国通过发达的信用体系来推动消费市场的繁荣),让所有的人都不要有后顾之忧,减少身体过度透支,或为了“防患于未然”去过度储蓄,这样,就业市场、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就能为结构调整和就业稳定之间的矛盾发挥更为有效和积极的作用。

第三,金融创新虽然是一把双刃剑,但对中国经济而言,需要充分有效的利用它来帮助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质”的飞跃!

尽管全球目前对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对这场危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何况危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所以,对金融监管的内容和范围也就无法给出令人信服明晰界定。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已经让全世界意识到滥用金融创新工具的严重危害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噎废食——正是因为我们今天金融创新带来的疲软,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摆脱不了制造业治国的单一经济结构,才使得我们在没有强劲内需的环境下只能去发挥要素价格的竞争力(劳动力、汇率、土地成本和油价等要素价格的低廉特征)优势去争夺更多的外需,

以支撑我们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内部流动性过剩和外部被动的政府外汇投资方式,不利于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去享受当前金融大海啸那样的外部冲击,更不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取得公平有利的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地位。如今在汇兑中吃了大亏的一些中国企业都在抱怨:“美国金融危机反而让一直疲软的美元突然之间走得异常坚挺,我们好像真的在被人任意摆布”。

现在,大家都认为要加强信息沟通,以减少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危害性。我们也在思考目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和机遇,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模式的同时,还在探讨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拓宽国内市场投融资渠道,建立境外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等各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创新”计划。

最后,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尤其需要关注政府在制度设计、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美国政府对其创新环境和精心培育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现在已逐步意识到了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美国的大国发展战略(比如经济全球化战略,货币主导权的扶持战略等)减缓了很多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更多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我们在战略上也要非常重视培育“政府”和“市场”之间“亲和”关系,而从战术上则要巧妙地解决好市场机制中时常出现的“效率”和“稳定”的冲突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 ■外论一瞥

#### 《金融时报》12月18日文章 重振世界经济五点建议

经历了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人们对经济前景仍然心有余悸。尽管通向光明的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出于理性,以下五点都是应该考虑的。

首先,政府虽然已经果断地保护了正规银行系统的完整,但现在就欢呼胜利还为时过早。为了加强银行的力量、保证其借贷的功能,欧洲的银行将再需要1000亿至1500亿美元的资金,而美国的银行,包括地区性银行,应该尽快被分配额达35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

第二,政府必须为维持信用流和重建债务提供便利。资产购置和政府担保必须保证现金流向好的公司和购房者贷款者。对于一些陷入过多债务的公司,以券抵债的交易方式是必需的。

第三,财政政策的各个方面要切合经济衰退的深度、信用的丧失以及就业和收入的压力。欧盟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据称要相当于欧盟生产总值的1%,但这一规模在衰退进一步加剧的2009年还需要扩大。奥巴马鼓励科技、绿色环保、非传统能源产业的发展,并承诺2010年底创造或维持250万份就业机会,这一承诺也许不能按期兑现,但计划理应执行。

第四,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能否为经济衰退打入一剂强心针,美联储宣称利率将降到0.0-0.25%,欧洲利率跌跌撞撞至0-1%,其他银行将发现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非正统的货币政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维持了低利率水平,但也有可能拉长长期利率。

第五,信任被粉碎后,经济机构需要有效的领导回归公众授权的信任中。信心不能插入经济模型中,但它却事关重大,足以左右经济形势的发展。(贺艳燕 编译)

#### 《基督科学箴言报》12月17日文章 行贿之疾推动欧美提高反腐标准

美国创下了有史以来对贿赂案的最大罚金——对工程制造业巨头西子公司征收8亿美元罚金。然而,在这里让人失望的事件背后,至少还有那么一线希望透射进来。

2006年,当西子公司获悉其正在被调查时,它开始采取合作的态度。公司频繁、广泛地向美国政府报告其动态,并强化其反腐措施。当然,西子公司的确有这样做。美国司法部称,由于西子给予调查者以“非同寻常”的帮助,因此,司法部最后征收的罚金大大少于原定的2.07亿美元。而且,这种合作促进了全球的反腐努力。

每年,全世界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其中就包括贿赂。由于贿赂阻碍了竞争,也就阻碍了发展。因为,大笔的钱流到了腐败分子的私人腰包,而这些钱本来应当被用到公路、学校和卫生保健上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制定反腐计划。联合国在2003年制定了《反腐公约》,这是联合国控制腐败的唯一全球举措。

行贿之疾推动了西方许多公司提高其反腐标准。公司高管认识到哪怕是行贿传言也会损害公司的形象,有时候这种损害比法律的惩处影响更甚。近年来,欧洲在禁止给予外国官员秘密的资金支付以换取合同方面日趋严厉。这对于推动公司建立更高的伦理标准——更加努力工作,在质量和价格上竞争——具有乘数效应。

然而,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说,在发达国家,反贿赂法律的实施仍需改进。这一组织的另一份调查报告发现,欧洲三分之一上市公司认为当局并不愿意对贿赂案件提起公诉。(张金翠 编译)

#### 《纽约时报》2008年12月19日专栏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信赖麦道夫

在人们的心目中,麦道夫一直是卓越的投资家、慈善家和金融界的支柱。因此,“麦道夫是个大骗子”这件事一经媒体曝光,便震惊了整个世界。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之庞大规模让人匪夷所思。

金融服务业一直声称,在过去的一代人中,他们构成了国家收入中持续增长的份额,使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可思议地富裕起来。然而,这一行业相当多的部分似乎是破坏价值而非创造价值。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玩弄钱的那些人对我们整个社会产生了腐蚀作用。

在最原始的层面上,华尔街模式腐蚀了并继续腐蚀着美国的政治。从布什政府的官员到民主党人,无一例外地做着同样的事,那就是“金钱说话,政客跑腿”。同时,多年来,迅速致富的磁石般吸引力把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引入了投资银行业,而这又以牺牲科学、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为代价的。最糟糕的是,膨胀的金融体系所赚取的巨大财富逐渐地使我们的现实感弱化,让我们的判断力退化。

其实,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没有注意到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预警信号。例如,为什么阿兰·格林斯潘几年前还曾公开宣称:“金融体系整体上已经越来越有活力了”?我认为,对问题的答案在于,精英们天生倾向于崇拜那些赚钱的人,而且猜想他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人信赖麦道夫先生的原因了。(张金翠 编译)

#### 《经济学家》12月18日专栏 闭目塞听的投资

麦道夫诈骗案不是有钱人被骗取大量资金的第一宗大案,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宗,但确实至今还没有如此众多的金融机构欣然赴会,被骗局洗劫。可悲的是,原本在金融海啸中避难的少数全球银行,这次也被列在了麦道夫诈骗案受害者的名单上,如英国汇丰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还有瑞士和新加坡的一些私人银行。除了银行,一些公司,如英国的“男人集团”(Man Group),美国的Tremont资产管理公司损失更为惨重。这些公司本身也是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其投资额占到整个行业的一半。

其实早在2001年,麦道夫所为就引起了对冲基金行业杂志MAR/Hedge的怀疑,该杂志采访了十几个对于价差执行转换套利交易策略较为熟悉的交易员、量化分析师以及基金经理。他们表示,“令人吃惊的不是麦道夫如此高的年回报,这可能会和公司的市场操作和交易员的能力有关。真正让人吃惊的是,麦道夫可以保持几乎没有波动的平稳回报。”

在这场诈骗案中,愚钝的不仅仅是投资者,管理者同样也后知后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至少有追溯到1999年的可信而具体的指控,但未作大力挖掘,仍依靠麦道夫自愿提供的报表和报告。(贺艳燕 编译)

#### 《日本经济新闻》12月19日社论 原油价格下落并非善事

OPEC决定从明年1月开始日减产220万桶,这是今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减产决定,三次减产的幅度共计每日日产量减少420万桶。俄罗斯也将每日原油出口量的削减幅度扩大到67万桶。石油生产国大幅减产无疑源于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石油需求的不足。尽管5个月来油价已降到了最高纪录的三分之一以下,美国对石油的需求依然低迷。即使在之前石油消费大幅增加的新兴国家,也由于经济增长减速而导致对石油的实际需求难以增长。在此背景下,OPEC大幅减产依然难以遏制原油价格的下跌。

对于原油价格,我们必须有完整的认识,过度下落不见得是一桩善事。其一,尽管原油价格的下降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原油消费国经济衰退的速度,创造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但是对于石油生产国而言,在原油价格每桶40美元左右的时候,大多数石油生产国的财政收支转为赤字,经常收支也面临大幅赤字转向赤字。再加上金融危机影响,之前扩大投资和消费的石油生产国,其经济增长正在不断减速。

其二,原油市场的大幅下跌和金融危机的恶化导致新资源开发的推迟和停滞。没有替代品的出现,未来的资源供给仍将过分依赖原油,原油价格极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度飙升。(梁宝卫 编译)

## 扩大内需应立足中等收入群体

○崔宇

金融危机是局部的,经济危机则是“全球化”的。11月份主要统计数据的大幅跳水给中国经济蒙上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唯一值得欣喜的数据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月份同比增长了20.8%,而且今年以来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实上,尽管中国的投资率、消费率一直偏低,但据统计,2007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了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

当然,我们却不能断言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拐点,因为最终消费率近几年仍然在下滑,从2000年的60%下降到目前的36%左右,而且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一直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拉动消费增长的主体更有可能是政府,而不是居民。

据社科院最新的《社会蓝皮书》预测,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到7%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与之持平,也在7%左右,收入下降的预期并不支持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基于这一判断,不可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盲目乐观,也不应该把拉动内需的重点过分向投资倾斜,尽管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但再像上一轮经济衰退时那样全国范围内大搞投资“保

增长”,恐不仅会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还会延缓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把保增长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非得消费作为突破口不可,而且拉动消费不能靠补贴农民扩大农村市场来启动,必须立足城镇化中低收入群体。

目前,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大致在65%左右,启动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将会带动消费的快速增长。而且,中等收入群体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较大,他们的消费重点主要在旅游、文化、电信和保健等领域,这种需求导向也有利于消费产业结构升级。在合理的产业布局下,还可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而不是像现在集中在面向外需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需疲软后,企业效益下滑,技能单一的农民工只能被迫返乡。

从政策层面传出的信息来看,目前的“救市”还停留在加大投资、合力拯救房地产和出口企业以及加大农民补贴力度上。近几个月,政府的财政收入已大幅度下滑,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更合理的支配财政资源无疑需要更审慎的抉择。

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在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但目前看来,结构性减税只体现在企业层面,包括增值税转型和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而直接针对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比如汽车消费税和购置税等)则



### 民间股神牌子砸了

幸福总是相同的,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幸。经过2008年的熊市大洗礼,许多带着民间股神光环的私募“大佬”们纷纷败走麦城。曾经的炒股冠军、坐庄主力们,有的关张,有的入狱;曾经呼风唤雨的私募机构、民间股神们还能东山再起吗?

“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只是在房地产行业的热和营业税方面有所优惠。事实上,房地产才是阻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最大障碍,它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让房地产价格合理回落是扩大消费的题中应有之意。

短期来看,启动内需最主要是调整个人所得税,给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以消费信

心,由于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比重大致在7%左右,提高起征点或者减少税率档次和降低边际税率都应该可行的选择,不会引起政府税收的大幅度波动。长期来看,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应该提速。在危机时刻,最需要信任的是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居民,他们的信心才是比黄金更珍贵的。

### Column 专栏

按照目前的石油需求趋势,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石油需求乃至一次能源需求第一大国,也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逐级的提高税率,逐渐消化能源成本和一系列改革成本,形成比较高的能源价格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乃至形成低碳经济和脱碳经济,是中国能源政策的必然趋势。

## 别侥幸,尽早准备应对下一次石油危机

我们中国人非常幸运,没有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因此,我们对能源的认识可能远不如欧美人那么有切肤之痛。所以,从政府到百姓,我们嘴上喊得多,实际做得少。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十年间,世界石油市场处于低油价周期,石油很便宜,我们似乎也不是很紧张。2003年开始的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暴涨确实让我们捏了一把汗,也开始真正感受到能源危机的可怕。要知道,以2007年1.6亿吨的进口量计算,油价每上升10美元,我们付出的成本就增加120多亿美元。说实话,在能源方面,我们还没有为经济的崛起做好充分准备。虽然从198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到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重组逐步实现了市场化、国际化,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应对世界能源市场风险的能力。

今年7月中旬,国际油价终于在基本面逆转的大背景下掉头向下,从每桶147美元一路直下跌破每桶40美元一线,最高跌幅超过70%。每桶40美元左右的油价让中国人渐渐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感到此时便是调整能源政策的好时机,燃油税方案的迅速出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时机选得确实很好,成品油价格面临下调,而税率又不是很高,大家相对负担还可能减轻了,皆大欢喜。

目前,成品油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活动已经结束,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公示了征求意见稿,也做了很好的总结。此前,很多媒体都组织了专家讨论,存在的问题基本说清,当然,期望者有之,失望者有之。现在尘埃落定,还是从长计议吧。但是,从出台的方案和其后的各种议论当中,我似乎没有看到大家对能源紧张形势有多少急迫的认识。燃油税的争论没有跳出利益纷争的窠臼。不是说不该争论这些,而是希望大家的眼光能放的更长远些。

燃油税是什么?它应该是包括石油产品消费税等在内的车用燃料间接税的统称,而非单纯指“费改税”,即取代养路费、公路客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等相关规费后的车用燃料税。燃油税的效果需要从能源、环境和经济三个方面来衡量,即燃油税是否能够促进节能,是否能够促进减排,是否会引起GDP和就业等经济指标的剧烈变化。这就需要保证燃油税反映石油产品的供需关系,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反映

环境成本。按照现在的税率,即便考虑到成品油价格下调(5-8元,税率也不过20%左右)。这样的税率显然很难实现上述目的。

按照目前的石油需求趋势,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石油需求乃至一次能源需求第一大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目前已经超过50%,到2030年将达到75%。2007年-2030年,综合组织(OECD)国家由于非运输行业石油需求的减少,石油需求将呈现下滑态势,所有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主要源于非综合组织(Non-OECD)国家。其中,中国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贡献率为43%。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抑制巨大的能源需求,根本不用等到下一次石油价格暴涨来临,即便是石油价格重新回到七十美元的位置,中国也将再次承受巨大压力。担心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而且,即便全球的石油供应比较充分,价格能够保持平稳较低的水平,对石油的需求必然会使碳排放快速增长,中国也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有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超过了美国,这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我们成为世界工厂的梦想已经几乎变为现实,但是,这种依靠化石燃料推动的制造业和经济发展模式怎么可能持续?在这样的

背景下,怎么实现科学发展?或许今天我们还能勉强维持,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维持呢?

逐级的提高税率,逐渐消化能源成本和一系列改革成本,形成比较高的能源价格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乃至形成低碳经济和脱碳经济,是中国能源政策的必然趋势。

笔者因此认为,中国应当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而不是与国际接轨来制定能源价格政策。因为与国际接轨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世界各国能源政策千差万别,美国的低能源价格政策对全球而言是个灾难,也扼杀了其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创新力。当年,美国的IT产业发展的潮流,今天,面对高能源价格和低碳经济的世界趋势,顽固不化的美国汽车产业已经被日本汽车打得一败涂地。总结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高能源价格几乎与经济竞争力属于反义词。没有高能源价格,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只能充当别国的打工仔而失去竞争力。

以此观之,燃油税方案的出台恐怕只是中国实现高能源价格的第一步。未来中国必须引进能源税、碳税、环境税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与能源税对经济增长的微弱影响相比,能源安全成本和环境成本的节约将是巨大的。只有这些政策陆续出台,到位,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做大做强。(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学者)